※ 香港經學研究專輯 ※

「港臺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座談會紀錄

車行健、倫凱琪* 整理

臺灣與香港學術交流互動頻繁，影響學界數十年的「港臺新儒學」可說即是在這學術環境中形成的。在經學領域方面，港、臺經學研究各具特色。近年來，透過人員的互訪及學術會議的召開，關係日益密切。而承受臺灣經學社群的啟發，香港學界不但舉辦了經學會議，而且還自覺地將「香港經學」當作研究的對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林慶彰教授及其團隊長期關注香港經學，除了進行香港經學文獻的蒐集整理工作外，亦對香港經學研究狀況有所掌握，與香港的經學研究社群互動密切。二〇一五年五月六至七日，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與新亞研究所聯合主辦「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於這是史上首次以「香港經學」為範疇所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意義重大。林慶彰教授應主辦單位之邀，特地率領其研究團隊專程與會。主持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世界漢學研究室」的張萬民助理教授聽聞此事，在同系郭鵬飛教授的協助下，於五月八日上午邀請林慶彰教授及其團隊，來到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舉辦一場「港臺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除對港、臺二地經學研究的成果與現狀加以回顧與評述外，更希望對涉及雙方在經學研究上的互動與影響，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與可能合作等方面的議題，有更多的省思與展望。

當天活動流程分三個部分：首先，是張萬民教授的開場白、人員的介紹、贈書儀式，和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李孝悌主任的致詞，該系張隆溪講座教授也陪同出席。第二部分，是林慶彰教授發表題為〈從幾個論題看臺港《詩經》研究的異同〉（發言內容見下文，文稿另見本專輯）的專題演講。第三部分，則是與會學者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倫凱琪，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生。

針對座談會主題的發言內容及來賓的提問與回應。主辦單位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世界漢學研究室，座談時間為十點至十二點三十分，座談地點在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六樓 R6143 視聽教室。本文所記錄的與談者除林慶彰教授外，還有蔣秋華先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金培懿女士（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車行健先生（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吳儀鳳女士（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馮曉庭先生（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邱惠芬女士（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和魏綵瑩女士（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主持人為郭鵬飛先生（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

此座談會紀錄，先由政治大學中研所倫凱琪同學根據當天活動流程的第二、三部分之發言錄音做出逐字稿，復經本人做初步的修訂統整，然後再交由座談會發言學者修改確認。須說明的是，某些當日參與座談的學者婉拒將其發言內容公布，為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座談會紀錄均將這些發言內容抽離出來。此外，紀錄既將發言內容用文字書寫下來，且又經當事人加以刪訂修改，甚至潤飾補充，因而最後所呈現出的文字定稿，不必然會全同於當日實際發言內容，這應是所有將口語說話的內容予以文字化後的必然現象，只是所言與所書二者對應的距離大小罷了。

車行健謹識

主持人郭鵬飛教授：

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今天很榮幸請到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教授與臺灣的經學研究團隊蒞臨敝系出席「港臺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經學的研究與發展自民國後陷於衰退，而道德人心則日夕淪喪，為區區利益而出賣人格者比比皆是。數十年來，林教授帶領臺灣的團隊，積極復興經學，培養很多人材，更不辭勞苦，四處奔波，散播經學的種籽，足跡遍及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國、星馬、越南、美國、歐洲。他們以無比的堅毅，做純粹無私的奉獻，為的是對應這個禮崩樂壞的晦暗時代。他們這種近乎宗教的精神，使我想起大學時代所讀，現在仍縈繞心頭的一段話——熊十力《讀經示要·序》：「念罔極而哀悽，痛生人之迷亂。空山夜雨，悲來輒不可抑；斗室晨風，興至恆有所悟。上天以斯文屬余，遭時屯難，余忍無述？」這也許是從事經學者共有的悲憫情懷。

以下我們請中文及歷史學系主任李孝悌教授，致送紀念品予林慶彰教授與臺灣的經學研究團隊。

林慶彰教授：

這一次來香港開「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內心特別激動。其實在五、六年前，還沒有人用「香港經學」這個詞，像浸會大學傳統文化中心主任劉楚華教授，說我們香港是文化沙漠，什麼都沒有。我说不應該什麼都沒有，應該要把它開發出來，像經學就很值得開發。我在浸會大學的名師講座裏提到，香港的學者應該要做一些事情。第一，要編一部香港研究經學的論著目錄，把自己的財產清理一下。第二，香港的學者應該多參加國際會議，可以讓人家了解你也是研究經學的。第三，應該要辦國際會議，讓世界各地的學者知道有這個大學，有誰在研究經學。第四，申請研究計畫的時候，要多申請經學的研究計畫。這五、六年香港研究經學的學者各自努力，昨天和前天的會議，就可以看出研究的成果。這次開會有三十一篇討論香港經學的論文，非常讓人驚訝。但是，香港經學的基礎還是很薄弱的。像最基本的工具書還沒有編好，就是香港研究經學論著目錄。盧鳴東主任已經著手編輯，不久就可出版，我為了要表示對香港經學的關心，所以我也編了一部《香港經學人物研究文獻目錄》，竟然可以達到五六百頁，就可以知道香港經學不是沒有，而是大家並不注意它。如果這兩部工具書完成，那香港經學的研究就已經可以起飛了。這一次來城市大學，要談港臺經學研究的問題，我想如果全部都談的話，可能要談好幾天也談不完。如果談一個經也滿困難，所以我就從一個經裏面抽出幾個問題，來試試看港臺學者的研究有什麼不同。其實是有異有同，我們先看我的報告的「前言」，要討論這個問題，應以文獻作為立論的基礎，基本文獻中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就是我一直努力去編輯的，已經出到第四編了。收錄的條目有十萬條，十萬條就是臺灣和中國這幾年研究經學的成果。香港方面，因為香港的學者還沒有做這一方面的整理工作，所以我就越俎代庖，整理了兩篇香港《詩經》研究文獻目錄和香港《詩經》研究述要。以下的討論都是根據這些資料而來。

我們來看《詩序》問題。民國時期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把《詩序》問題看得非常簡單，《詩序》就是衛宏作的。百分之八、九十論《詩序》的文章，大概有三十多篇都是說《詩序》是衛宏作的。他們根據《後漢書》的一句話，說「衛宏作《詩序》」流傳到現在，這樣的話，《詩序》的作者就沒有什麼好討論的了。其實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後，港臺學者研究《詩序》有比較大的進步。除了討論作者之外，另外還談到《詩序》的思想、價值、缺失，就變成多元化的討論和研究。《詩序》在臺灣和在香港的確是差不多的。這個不多講，但是我有一個最新的看法，

我想我講了大家應該會同意我的說法。各位請看最後一頁，《詩序》問題，我覺得《詩序》不可能是子夏作的，從《左傳》裏面的賦詩引詩，我們就可以知道，哪一個諸侯引了什麼詩，其他的諸侯都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當時教《詩經》的老師不只一位，每一個諸侯教他《詩經》的老師應該都不一樣，但是他教出來的學生卻可以都了解對方講些什麼。從這裏就可以知道，這些教《詩經》的老師應該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這一首詩的主題是什麼。如果把這些共同的認識編輯在一起，應該就是現在所謂的《詩序》。這個編輯的人可能是子夏，也可能不是。我想這樣講應該最合理。不可能到東漢時代，衛宏才來作《詩序》。我準備寫成一篇文章，把這個觀點寫進去。以上是討論《詩序》。

至於在字詞考釋的方面，香港跟臺灣都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像臺灣的話，屈萬里老師的幾篇論文都可以算是經典之作。他把很多不容易解釋的，弄不清楚的，都把它考訂清楚了。另外，我也寫了一篇〈釋《詩》「彼其之子」〉。兩千多年來沒有人能解釋清楚，把這個「其」解釋成虛詞，「彼其之子」就很難說得通。我受馬瑞辰的影響，把「姬」解釋為「姬姓」的「姬」，這句話就通了，「彼其之子」就是說那姬家的少年，他不必跟我們一起去當兵，他是貴族，所以不用當兵。「彼其之子」就是那姬家的少年，臺灣大學的龍宇純教授也很贊同我的說法。除了我這個說法之外，臺灣師範大學的季旭昇教授和他的老師余培林教授也都認為「彼其之子」的「其」不是虛詞，而是實詞。因為這首詩的另一章是「彼劉之子」，那個劉是現在劉邦的「劉」。同樣句子的形式應該也可以證明這個「其」也是姓氏。這樣兩千多年來沒有解釋通的，就能解釋通了。因為我對我自己的研究比較有信心，所以我就舉這個例子來證明《詩經》字詞的研究，還有很多可解釋的空間。香港方面，成就比較高的就是李雄溪教授的考訂，我覺得都非常的正確。所以我們從兩邊的考訂來看，香港方面和臺灣方面對《詩經》字詞的解釋都有很多研究成果，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再來第三個問題，就是淫詩問題。淫詩問題其實是朱熹讀〈鄭風〉的時候，對〈鄭風〉的誤釋。因為孔子說「鄭聲淫」，這個「淫」應該是指太過分，就是太超過。就好像說我們現在有人很喜好搖滾樂，搖滾樂對年紀比較大的人來說，是太過分了，所以孔子才有這樣的一種說法，並不是淫蕩的淫。因為港臺的學者都知道，這是朱熹弄錯的，所以大家都不太去討論淫詩問題，可見這個淫詩問題應該是一個過時的論題，這可以從港臺學者不太寫淫詩問題的論文看得出來。

國外漢學的研究問題，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論題。我們看臺灣研究日本漢學和日本《詩經》學的著作非常的多，但是香港一篇都沒有，這是很奇怪的事。當然，我還不知道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可能是一九四一年以後，香港被日本占領，所以懷恨在心，就不研究日本漢學或日本《詩經》學。在韓國《詩經》學方面，反而是在臺灣沒有什麼研究成果；但是在香港，盧鳴東教授已經寫了好幾篇的論文，這是開風氣之先。

再來，歐洲方面的研究，大部分都注意到理雅各、葛蘭言、高本漢，還有偉烈亞力。其中以理雅各和高本漢為例，都有翻譯本或者很多論文。在香港，李家樹教授的著作特別多，有討論到這方面的論文，可以提供給我們參考，在臺灣也有不少論文。在高本漢方面，香港和臺灣都有不少的論文可以參考。而在香港，有撰寫研究偉烈亞力的論文，在臺灣則還沒有看到討論偉烈亞力研究《詩經》的論文。至於葛蘭言，研究葛蘭言的論文臺灣也有，但是香港還沒有注意到葛蘭言對東亞《詩經》學的影響。在美國方面，研究龐德的論文也不少，但是香港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論文，可見香港跟臺灣雖然空間的距離非常的近，但是做研究的時候還是各有所需，各有所取。所以，我們如果沒有做這樣的比較，應該不太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是把所有的經學著作都用來做比較的話，應該可以得出更多不同的結果來。如果像日本的話，日本漢學當然是留下很多資產，像江戶時代的《詩經》學可以讓我們研究好幾輩子。我們也希望香港的學者能一起參與這方面的研究，將來可以在香港開東亞《詩經》學的會議。我簡單的報告到這裏，因為有不少在座的學者對《詩經》學的研究都比我要高明得很多，他們的意見可能更新穎、更有價值，謝謝各位。

郭鵬飛教授：

謝謝林慶彰先生。很簡明扼要地介紹港臺《詩經》研究的狀況，非常清楚。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就來看哪位老師先發言，自由發表就好。

蔣秋華教授：

文哲所在經學方面，經學文獻是研究方向之一，其他的文與哲方面，各有兩個方向。相對地，我們的團隊人數就比較少。剛開始的時候，只有三位研究人員，然後經過將近二十多年的發展，慢慢成長，現在已達到了六位研究同人。人數雖然

少，比文、哲方向的人少一半，可是我們的研究成果絕對不會比他們遜色。無論舉辦活動的能量，或是出版物的數量，我們都不會輸給他們，甚至可能還會比他們都還要多。

在學術交流上，所內同人雖少，但是我們也主動跟外界合作。除了凝聚臺灣志同道合的學者，邀請參與所內舉辦的學術會議，我們也積極地向外參與活動。大陸方面，剛開始的時候，林老師帶著參加《詩經》學會主辦的會議。後來在《春秋》學、《尚書》學、禮學這幾方面，也都跟大陸有很多的合作。例如跟揚州大學辦了好幾次的學術會議，甚至他們對於揚州學派的研究，也是因為我們這邊開始了、啟動了，並到他們那邊參訪，經過交流之後，促進了他們對於這方面的重新認識，本地人才開始重視，也才有後續的揚州學派學會這類學術組織的出現，以及學術會議的舉辦。整理揚州學派學者的著作，才接著慢慢出來。

在歐美方面，我們也有很多的互動，像在德國慕尼黑大學、特里爾大學，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我們都跟他們合辦學術研討會。在香港，也辦了好幾次，剛剛的贈書裏頭，就是其中部分跟浸會大學、嶺南大學合作的成果，與這兩所大學至少都辦了兩次以上的會議。有的成果已經出來，有的成果在陸續準備出版中。

在學者方面，早期的時候，老一輩的學者，像單周堯教授、李家樹教授，他們都到文哲所訪問過。我們在外頭開會時，已經常常和這幾位資深教授有所互動。後來，也漸漸認識一些年輕輩的學者，像在場的郭鵬飛教授、盧鳴東教授等等。我們也是因為在一些學術活動上，像在大陸開《詩經》會的時候，才跟浸會大學的盧教授，還有陳致教授認識。後來便積極地邀他們參與文哲所的學術活動。接著香港方面，也邀請我們參加學術活動。例如邀林慶彰先生來做學術演講，一些會議也積極地籌劃起來。

在先前，我們覺得香港經學方面，大概邀請的多是老一輩的老師，像是左松超教授、李雲光教授曾經來這邊講學，或是演講。在學術會議方面，兩地的共同活動，相對地比較少。後來有許多年輕輩的學者出來了，可是因為散在各個學校，彼此間的合作似乎較少。林老師就希望推動香港的經學，能夠熱絡一點，因此鼓勵他們合作。於是，經常邀請他們來參加文哲所舉辦的經學會議，因為他們經常的到來，又跟臺灣的其他大學有合作的關係，雙方的學者也就更加地熟悉了。這種情況之下，這批年輕學者慢慢成長茁壯起來了，如今也紛紛各擔任一些行政工作，所以他們就考慮是不是可以多舉辦一些學術會議。在此基礎之下，召開了多次的會議，

有經學的，也有出土文獻的會議，大量地邀請臺灣的學者，讓彼此的互動增加許多。

林老師也做了一些策劃，曾經做一些專題來介紹香港的經學家，如在《國文天地》裏，針對七位研究經學的學者，做了比較深入的訪問和介紹。（謹案：見《國文天地》第 278 期〔2008 年 7 月〕。包括：李家樹、單周堯、郭鵬飛、李雄溪、陳致、許子濱、盧鳴東等七位學者）因而將香港的經學成果和學者，讓外界更為熟知認識。另外，剛剛林老師談到，他希望香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應該讓更多人知道；像這一次召開的香港經學會議，對臺灣學者來說，有些困擾，就是：香港有哪些經學家，還有他們有哪些著作，是我們可以研究的？一般，我們因為工具書不多的時候，覺得非常的陌生，所以要選擇撰寫的題目就不容易。林老師便與盧教授整理了兩份有關香港經學研究成果的目錄，希望提供有興趣的研究者，有所依循的方向。透過這些目錄，我們可以認識有哪些的學者，還有哪些著作，甚至他們出版的狀況。這樣要來研究相關議題，也就比較便利。

經由各方面的合作，港臺兩地看起來彼此也愈來愈熟悉了。我們不久也要在臺灣舉辦學術會議，如蔡長林教授馬上就要辦一個有關《春秋》人物形象的會議，香港有好幾位教授都答應要來參加。從這上頭，我們可以看到，港臺兩地的經學合作是相當密切的。其實不止在經學，其他方面也有合作，像文哲所的文學研究同人，也曾跟香港的大學共同舉辦過一些會議。

以上是對港臺兩邊的合作情況，以經學方面為主，所做的簡單介紹。

郭鵬飛教授：

謝謝蔣教授。蔣教授很概括地介紹了我們香港跟臺灣在經學互動方面的狀況。

車行健教授：

張萬民教授跟我聯繫的時候，有討論到我們這個座談會的主題是什麼？我大概提供了我的意見，主要就是連結到浸會大學剛剛舉辦過的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的研討會。因為我們是臺灣來的，所以就建議說是不是能夠辦一個港臺經學的回顧與展望的討論。剛才前面張萬民教授的介紹，背景的說明，還有林慶彰老師和蔣秋華教授他們都講到一些重點，接下來我就根據自己的想法和觀察，提出三個角度或面向的思路，謹供大家參考。第一個，講到港臺之間的經學或是學術之間的一

個連結互動。當初在跟張萬民教授討論主題的時候，我腦海中一直出現一個名詞，就叫做「港臺新儒學」。這大概已經變成一個專有名詞，甚至變成學術關鍵字。就港臺新儒家而言，那當然是在戰後特殊的時空環境的背景下，一批從大陸出來的學者，不管你怎麼看待他，說是文化保守主義，或跨國漂流什麼的，反正就是有這麼一批學人從大陸來到了香港和臺灣這兩個地方。這些學人在港臺兩地也都是有所互動，像錢穆、徐復觀，還有牟宗三等人，在兩地都培養出大量的學生，甚至可說留下很多的學術遺產。港臺新儒學現在已經是國際學界非常重視的議題，尤其在思想哲學這方面，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研究的項目。所以我覺得這不是臺灣學術界的遺產，也不只是香港學術界的遺產，而是我們兩地共有的學術遺產。我們在討論港臺經學的時候，其實就一直有港臺新儒學的範例在前面。我不敢奢想我們能做到當年這些權威學者所能夠做到的地步，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學術機運，因為透過這些年來的人員的互訪，彼此之間的學術社群的交流，這個氣氛是非常地熱絡，而且接觸是相當頻繁的。將來累積的學術成果，應該也是很可觀的。但是，我們當然也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港與臺，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共同的更大的文化，或是學術的母體，那就是中國大陸。如果再把中國加進去，變成港、中、臺三地學術的關聯互動等等，這裏面問題就變得很複雜，要講也真的是一言難盡。但我今天想舉一個有趣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下午要去學海書樓參觀，學海書樓是當年老一輩從大陸來到香港的前清遺老所創立。以賴際熙為首的這些人都有在廣州學海堂求學的經驗，所以從學海堂到學海書樓，這之間是有所關聯的。今年年初過年的時候，復旦大學的傅杰教授來臺灣訪學，他先跟我聯繫了，我就把在座的師友們聚在一起，辦了個餐會歡迎傅杰教授的到訪。在那過程中，剛好從學生那邊聽到一個訊息，就是臺北萬華有一個清朝遺留下來的書院，也叫學海書院。於是便趁著傅杰的到訪，邀請林老師、林師母和蔣老師一起去看看。學海書院大概是清朝道光年間創立的，原來也不叫學海書院，後來在一個官員主導下，把它改做學海書院。到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海書院就沒有了，後來因為產權的關係，它就變成了高氏宗親祭祖的祠堂。主體建物還在，被列為三級古蹟，可是因為是私人產業，不對外開放。外人要去看，也不容易看得到，要透過裏面的人介紹才能夠進去看。為什麼要講這個呢？前幾天碰到區志堅教授，跟他提到這個事，他也不知道臺北有一個學海書院。但這個學海書院，跟大陸的學海堂有沒有關係，我也不知道，還要去研究。但至少當年官員取了這個

名字，可能腦海中也有學海堂的模範在那邊，或者他們就有就讀於學海堂的學術背景？這個還可以再查考。但比較可惜的是，現在這裏已經不叫學海書院，而是變成高氏宗親的祠堂。與其相關的一些活動、設施、場所，裏面的一些史料，大概已都沒有了。我們要去查考它的歷史，大概也只能從地方志，或其他的相關文獻去看看能不能勾織出一些當年的活動或實際內涵等等。

對照之下，廣州的學海堂下場又是如何呢？大概十年前我們也曾去過廣東考察，當時也到過廣州的越秀山去看學海堂的狀況。但可惜的是，早就片瓦不存，什麼東西都沒有了。這個事也不能賴共產黨，因為這是國民黨幹的，早在孫中山那個時候，就已經把學海堂的主體建築拆掉了，改建成其他政治性用途的建物。所以，現在大陸的學海堂已經連遺址都看不到了，臺灣的學海書院主體建築雖還在，但早已物換星移，既不叫學海書院，且又轉變成高氏宗親的祠堂。

相反地，只有香港的學海書樓一直延續到今天，從來沒有斷絕過，還一直持續地舉辦文化學術的相關活動。剛才林老師說，劉楚華教授前幾年跟他講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什麼東西都沒有。相對照之下，誰是文化沙漠？誰是文化綠洲？這有一個很大的印象的反差。但我講這個不是取悅香港本地的人，我只是有一個很大的感慨，從學海堂到學海書院，再到學海書樓，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但是三者的境遇卻有很大的差別，曾是文化母體的學海堂，今天片瓦不存；可能受其影響所分散出去的臺灣所曾經擁有過的學海書院也名存實亡，除了建築之外，什麼也沒再留下來；只有當年那些從學海堂出來的翰林遺老所創設的學海書樓，還持續地保存並宏揚他們心目中對傳統學術與文化的紐帶這樣子的連結。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令人感動的事情。

不曉得從多久以前，香港的學者們開始去討論所謂「南來之學」的議題。但南來可以溯源的更早，像賴際熙等人創立學海書樓，弘揚傳統學術，應也可以說是南來之學。但現在討論比較多的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來到香港的學人，像剛才講到的新儒家社群的南來之學。當然香港有南來之學，臺灣一樣也有南來之學。所以我們一樣都是有南來之學的經驗在裏面。但是南來之學是不是一定是邊緣？是附屬呢？是一個比如相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比較管線末端的呢？其實對照這幾年的發展，我覺得好像也不必然。我們的存在，我們的學術成果也是紮紮實實地在香港和臺灣生根落地，形成自己的一些學術的特色、學術傳統和風貌。更積極地來講，我們不只是消極的南來之學，我們還有可能進一步做到將南學北返的情況。或許口氣講得有

點大，但是我覺得不是沒有可能，就像剛才講到的港臺新儒家的研究，現在不是也受到中國大陸很多講新儒學的重視？就我們切身所研究的經學而言，在十幾二十幾年前，中國大陸學界有在談經學的嗎？有在經學領域中去開研討會的嗎？甚至去搞什麼中國經學學會的組織嗎？是沒有的。他們頂多就是《易經》、《詩經》，單獨地去弄，但以整體的經學去做號召，是沒有的。當年彭林先生來臺灣參訪之後，他受到很大的啟發，從此就立志把經學作為他研究的畢生使命。嚴格來說，彭林一開始也不是專門研究經學的，雖然他博士論文是寫《周禮》，可是他的思維和訓練還是比較屬於史學的。他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的，是劉乃和的學生，所以他並不太具有經學的主體的意識。但是他來臺灣之後，受到林慶彰先生和臺灣學界的啟發影響，他把臺灣對經學的重視和經學的整體意識帶回去了。他在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也有經學的組織，他開始在那邊講經學，而且又召開了很多次的經學研討會。他現在儼然就是中國大陸經學的代表人物，而他的這些所做所為，其實就是受到臺灣影響的。現在他們又在弄《儀禮》復原的工作。臺灣在四十多年前也做過類似的工作，主要是由孔德成、李濟和董作賓等人在接受美國基金會補助之下，在臺灣大學所弄的所謂「《儀禮》復原計畫」。別的我不敢講，但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毫不保留，毫不掩飾地說，其實我們已經是南學北返了。這裏面很大的關鍵，還是要歸根於林慶彰先生的積極提倡。

這讓我想起崑曲的狀況。在座的林師母是研究湯顯祖的，以前這邊的中國文化中心的主任鄭培凱教授也是研究戲曲的。在崑曲史中有一齣叫《十五貫》的戲非常有名，號稱「一齣戲救了一個劇種」。也就是說，像崑曲這麼發達的劇種，到了清末民初時，也衰微沒落得很嚴重。這個情況有點像經學。當時有很多崑曲傳習的活動，希望能將崑曲保存下去。後來就是《十五貫》這部劇作，重新救活了崑曲。當然現在崑曲很熱門，白先勇很積極地提倡。但的確可以說，以一個人或者是一齣戲的努力，是有可能把一個劇種救活的。學術或學科何嘗不是如此，我不曉得這樣講會不會太誇張，就是說，一個人的努力拯救了一個學科，但我覺得的確有著類似的情況。林老師之前臺灣不是沒有經學，也不是沒有人在提倡經學。但像林老師的老師屈萬里先生，號稱臺灣經學第一人（按：李濟語），像屈先生之類老一輩的老先生，他們也是在大學開經學的科目，去寫經學的文章。可是我總覺得他們那一輩的老先生，似乎並沒有那麼強烈的經學的學科意識，他們比較多還是從古籍的，從歷史的，從文獻的角度來看待經學。另外又有一批談經學的人，跟國民黨關係密切，

去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人用「黨國儒學」來稱呼他們所推動的經學或儒學。但用黨國體制去動員的經學，就有點像當年陳濟棠之類的軍閥去推動尊孔讀經運動，對經學的推廣來講，這些人的做法可能是反效果的。反而讓很多接受到現代知識的年輕人，對經學更反感、更討厭，這種搞法對經學是不利的。我覺得像林慶彰先生這種從學術出發，然後積極地去推動經學，才可以取得比較大的成效。不從學術紮根，而去奢談經學的推廣、經學的意義、價值等等，最終影響還是有限。你若無法說服學術精英的話，你怎麼去推廣？因為經學畢竟不是宗教，宗教可以不講學術，只談信仰。但經學若沒有在學術上得到正當性的承認的話，要推廣起來還是比較困難的。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再來，講到學科的主體性、自主意識這一點，特別是講香港的部分。如同剛才林老師所講的，前幾年來香港，當時香港的學界比較少去談經學，但不是說沒有這方面的研究人才或成果；其實還是很多的，像單周堯教授就做了很多的工作，還有他所指導的學生，對香港經學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但也許就跟臺灣早年的情況，或大陸學界的情況一樣，大家比較不太會主動去說我是研究經學的，要嘛就說是研究歷史，或研究文獻、研究哲學之類的，要嘛就乾脆說是研究儒學的。這樣講起來似乎比較體面些，光明正大些。講到經學，腦海當中都是比較負面的、反動、落伍的形象，所以不太好去談我是研究經學的。可是這幾年，隨著我們跟香港經學社群有更多的互動來往之後，大家開始慢慢地對經學本身有了自信，也比較敢說自己是研究經學的。座談會剛開始時送了兩套書，一套是嶺南大學第一次在香港辦的經學會議的論文集，第二套書就是浸會大學在五年前辦的中、日、韓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去年嶺南大學又辦了第二次的經學研討會，再加上這一次浸會大學辦的香港經學研討會，香港至少就已有四次專門以經學為名稱和對象所舉辦的學術會議。所以，從經學學科的主體性、主體意識來談，特別是以香港經學做為一個主體來談，我覺得這是意義非凡；表示這時候經學在香港這個地方落地生根，有它自己的特點、自己的自主性，展現出與大陸、臺灣，以及其他地方不同的面貌。這是一個值得正視的問題。今後我們可以去研究很多跟香港經學有關的課題，甚至可以指導學生去寫碩博士論文。

第三個要談的，其實是幫金培懿教授先鋪陳一下，暖暖場。我們談到東亞視域的角度，香港真的是很特別的地方，它的國際連結是比較多的，而且它有被殖民的經驗，跟臺灣是比較像的。只是一個被英國殖民，一個被日本殖民。但是它們也有

共同的或相關的地方，那就是太平洋戰爭的時候，香港曾被日本占領過。所以二者都有共同被日本統治過的歷史背景。

這兩天浸會的會議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一直被討論到，那就是香港大學的經學課程的中斷跟恢復的過程。中斷的原因就是因為香港大學在一九三五年聘請了許地山來主持中文學院。許地山有英美，特別是英國的漢學背景，他是牛津大學畢業的。但他又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跟胡適、顧頡剛等人一樣，是有一點反傳統的，他連漢字都主張要改革，可見他有多激進。在他腦海當中，大概也以為經學是腐朽的，是那些遺老在弄的東西。所以他來港大主政的時候，就把經學課程取消掉。因為這些課程是賴際熙、區大典那些遺老在教授的。後來許地山因為心臟病發作，英年早逝。在太平洋戰爭的期間，香港大學的經學課程也曾經中斷過幾年，戰後就開始恢復了。大概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後，香港大學重新有了經學的課程，是誰在那邊推動？誰去上經學的課程？就是一位叫劉百閔的先生。他也是大陸來的，跟國民黨的關係、淵源比較深，他在港大開經學的課程，今天他的書也是這次浸會會議討論的焦點。但劉百閔是怎麼去港大的？誰讓劉百閔進入港大的呢？就是一個叫林仰山的英國人。他的漢學底子很好，他本來在山東的齊魯大學，也曾被日本人俘虜過。據說他看了錢穆的書，對錢穆很佩服。他有一個很有名的學生，就叫柳存仁，柳公跟他講了錢穆的東西。很妙的，好玩的地方就在這邊，柳存仁的父親是南社的柳亞子，柳亞子跟許地山好得不得了，關係非常密切，二人是非常好的朋友。柳亞子跟許地山在新文化運動上的見解是一樣的，都提倡白話文，對傳統的八股文，以及經學的課程，都覺得在香港不應該再教了。他支持許地山，而且認為許地山的做法是符合潮流的。但林仰山呢？他是一個老外，一個英國人，也是一個漢學家。他把羅香林請進港大，把劉百閔也請進去，他本來也想把錢穆聘進去，但錢穆因為主持新亞書院的關係，所以沒有去香港大學。但他也有在港大開課，而且教授聯誼的活動也常常請錢穆去。劉百閔跟錢穆都是屬於文化保守主義的，我覺得妙的地方就是，一個中國人把經學課程從港大砍掉了，但又被一個英國人給救活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連結？裏面不單純是東亞的視域，更可以關聯到國際漢學的情況。我們對林仰山的了解比較少一點，他為什麼對這些東西會有興趣？他為什麼會欣賞錢穆？會去聘請劉百閔，然後容許劉百閔在港大開設經學的課程呢？他有什麼樣的想法？他對於我們所謂的中學、舊學，或是新學之間的取捨，他是像胡適、許地山或柳亞子那麼激進的嗎？還是說他會以一種比較客觀、中立，或是比較同情的態度

來看待？所以，我是覺得像金培懿所談的東亞視域之外，是不是要再加上國際漢學這樣一個更大的視域來談？這樣或許會更有趣。

郭鵬飛教授：

謝謝車行健教授綜述了經學在港、臺、大陸的發展。

金培懿教授：

今日，當我們這場座談會要正式開始的時候，這整個會場裏面，先後走掉了李孝悌先生，還有張隆溪先生，留在會場的城市大學教授，則有張萬民教授跟主持人郭鵬飛教授。也就是說，地主還有兩位教授朋友在場。在座的聽講學生中原有九位女同學，四位男同學，但剛才又走掉了兩位男同學，加上會場裏有一位負責行政業務的女士，我想應該是女職員。另外，還有從浸會大學來的盧鳴東主任，以及我們另外一位朋友黃老師，其他我們的聽眾中，還有兩位看起來應該像是老師，或是研究人員的兩位先生，再加上還有一位女士。也就是說，會場原先總共有二十三位聽講人士，現在繼續留在這裏聽講的香港學界友人估計還有約二十位，我們臺灣方面來了大約十位學者，剛好以一比二左右的比例，我們大家留在這個空間試圖就經學研究來進行真心對話。

首先，我個人也經常在思考，作為今日大學國文系，或者說是中文系中，一位教授經學的教師，他所面臨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現實教育課題。要思考這個問題，大致可以與我剛剛不厭其煩地說明了有關會場中聽講人數的此種遞減移動，有所聯結，對於經學研究不熱門的現況，我個人倒是也很習慣了。但因為今天座談會的題目是港臺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所以有關經學被冷落的問題現在姑且不談。在此我想要延續著前兩天，我們參加了在浸會大學盛大舉辦的香港經學會議的餘溫，而來跟各位在座的，多數的聽講同學來分享。看著依然坐在下面的各位同學，我心中一直在想：你們今天來到這個會場，如果不是被迫來的，那表示各位在城市大學就讀研究，當然也會對香港經學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寄予一定程度的關心，所以我個人想從我們大家前兩天在浸會大學參加會議所做的發表，提供一些訊息給各位參考。

在我發言之前，蔡長林教授剛剛所以如此心有所感地激切發言，其實是因為他一直在關注一個問題，那就是為學必須思考所謂：如何成為一個人這個問題。而

他這次與會發表的論文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經學的研究怎麼成為一個人？今天各位同學可能少數的同學仍在上課，而大多數的同學可能本學期課程已經結束，正面臨進入期末考階段的時候，卻還願意來這個會場聽講。我猜想你們心中可能正在納悶：這一批臺灣來的學者到底要跟你們推銷，或者介紹一個什麼樣的經學？或者說是想向你們說明一個什麼樣的學問？蔡長林教授昨天在浸會大學舉辦的會議上所發表的論文，其思考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成為一個人？經學的研究怎麼成為一個人？我的意思是說，他的經學研究應該不是各位原先所想的那種很刻板的印象，以為就只是文獻考據的古典學！然而此種不明究理的成見，或者說是一意孤行的誤解，卻經常可見！包括我自己就曾被同事揶揄道：「反正你們研究經學的就是做一些文獻目錄嘛，然後就考證啊、訓詁啊。」對於此種學術偏執狂，我只用了一句話回答她：「那是你以為的經學！」各位同學說對不對？這個問題就好像今日有人四處打著旗幟，大言不慚地說釋迦牟尼佛這句話如何說、那句話又是怎麼說，所以這部經該作何種解釋才是等等，以己意解經的人比比皆是，許多是沒有堅實的文獻證據的。如果是這樣，那隨便他怎麼說，但他得說那是他說的，可不能說那是釋迦牟尼佛說的，你們說對不對？這兩者之間不僅有很大的距離，簡直就是天差地別！有不少人說是在做學問，但他認識世界的方式，其實常常是一種極為偏執的見解，我個人覺得那種偏執的叫囂，並不能改變世界真實的原貌。蔡長林教授昨天所以會一直強調關於經學研究如何參與一個人生命的養成，他這個懇切說明的背後其實有一個學術的脈絡，那是因為在近代學術發展過程中，經學研究常常被哲學研究擠壓得非常的厲害。也就是說，經學研究跟哲學研究，即使在所謂中文學門之中，彼此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個很嚴重的拒斥現象，所以他大概是藉由這次參加浸會大學中文系盧鳴東主任舉辦的這個會議，試圖喚起會場上諸位與會學者去思考，作為所謂經學研究者的我們，要如何活潑潑地維持經學研究的活力。也就是說，任何一門學問，無論其名為經學或其他，設若它都不能參與你自己生命的改造，那麼這門學問恐怕就會遭受莫大的質疑，而不是因為這門學問叫作某某學！

另外，我想提供給在座各位同學另一個香港經學研究的訊息，就是在座的浸會大學中文系盧鳴東主任，他在昨天會議的論文發表中，提到了從香港的《自由人》到《自由報》這樣的一份刊物，對香港經學研究提供了我們一個非常嶄新的視野。也就是說，我們要如何從人物群像，比如說，港臺新儒家這樣的人物群像，或者從港臺新儒家延伸出去，包括剛才提到的劉百閔也好，或其他各位與港臺有關的學

人，從與香港有關的某一個學人的經學研究，進而拓展到報刊。也就是說，我們研究經學為什麼要看報刊呢？那是因為我們想知道，當經學面臨被迫重整編派進西方學制的時候，經學作為一門傳統學術過渡到學校體制內的新學科時，它同時又是怎麼重新介入民間的問題，也就是，經學怎麼在近代向民間推展的問題。換句話說，在一種傳統學問向近代轉型的過程當中，經學從漢武帝以來作為正學的此種絕大主流性地位，在近代以後開始弱化，甚至極端而言，是朝著經學不成學，或是消失的一個發展趨勢。比如說，《四書》跟《易經》轉為哲學；《五經》當中《三禮》喪失了它實踐的社會環境；《春秋》強調的華夷之辨，沒有辦法在今日這個所謂世界化的潮流底下，維持其學說主張的正確性；又或者諸如《詩經》轉向文學；《左傳》也作為敘事文學的一個源頭。我的意思是說：在今日中國學學術範疇中，當經之所以成為經的某些性質，一直被弱化的時候，經學的定義到底是被限縮，或是外擴？即使是作為古典解釋學，經學作為史、子、集的源頭，學界難道不需要重新思考這個作為所有中國學術底蘊的經學？還是說子、史、集等學術範疇研究的背後，它都將一定程度支撐經學所以成為學，並且得再重新編派進大學的學科中？我個人覺得，此等問題其實是非常嚴肅的課題，此等問題大概也是我們今後在思考港臺經學研究的未來展望時，可以思考的面向。當我們對此等問題進行思考時，就會牽涉到經學的定義，我的意思是說，如果經學的定義可以這樣被思考的時候，我們其實是不需要跟別人推銷經學研究的。

車行健教授剛才發言時，所以一直提到說他在為之後我的發言做鋪陳，那是因為我個人在這次的會議論文中提到：我們要思考香港經學研究，如果可以試圖把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也納進來，然後連接我們臺灣並聯結到香港，則這一條從中國東北沿岸向東南沿岸分布的東亞圓弧線島鏈，其所經歷過的近現代問題，不管那些問題究竟是我們可說的，抑或截至今日仍是不可說或不宜說、不願說的，其間隱晦的日本因素到底要不要被正視？其實我們要談日本問題，就不可能不談國際問題。我覺得今日中國崛起已經大到這樣，今天即使大陸來的張萬民老師在座，我想在座還有其他大陸來的同學，我們作為中國傳統學問的研究者也還是要這樣講，就是中國已經大到這種程度，我們在中國本土外部的，不管你是在文化上認同，或是在政治上有所衝突，我們恐怕還是不得不思考要如何跟中國 say no 的問題。我所謂的跟中國 say no 的問題，不是單純的反對問題，而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機器，或者是一個偉大的文化中國，其能否兼容並蓄各種不同意見的問題。在思考如何向中國 say no 的

問題的同時，作為中國經學研究之一員，我當然還是希望中國真正強大起來，這個大起來的中國不僅有容乃大地容得下諸多差異，這樣一個志在偉大的中國，就如剛才蔡長林教授所講的，或是車行健教授所講的一樣，不會有一個民族自己斬斷自己學術、文化的源頭。因為我們任何一個人若要思考現今面臨的問題，絕不可能在拋棄、無視過去歷史文化思想的情況下，妄想可以解決當下難題，因為那樣是不可能真正解決當前的問題的。就這個角度而言，我衷心希望中國大起來，只有中國真正大得起來以後，那我們才會對自己的傳統有信心，那時候我們談的經學可能會比較健全。

另外，車行健教授這次在會議論文發表中聚焦顧門中的勵耘弟子，主要在談牟潤孫先生的學問。我覺得車教授提到兩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就是說經學作為一門學科，它的發展空間如果被限縮了以後，經學研究的正途到底要如何選擇。比如說，我們今天一直談經學研究的人力很少，所以如果我們要跟各位推銷，就是希望擴大我們的學術人力版圖，這是一種方法。另外一種方法，我覺得還是要考慮傅斯年跟陳垣先生他們所考慮的，就是研究質量的深化。我個人認為這兩個步驟都可以同時執行的，說實在的，若有必要，我個人也不排斥賣膏藥。針對第二種方法，我個人則是在思考：經學作為一門最老成的學科或學問，它究竟要如何訓練諸如每一位今天來到這個會場，坐在下面聽講到此刻都沒有離開的各位青年同學？因為對任何一位年輕的學生而言，他要進入經學這一門相對在中文學門裏面非常老成的科目，他其實面對的困難度比任何一個科目都高！這個問題就好比牟潤孫先生當年老是覺得，顧頡剛先生派給他的作業很難做呀，他都不知道要去哪裏找資料，因為資料是那麼多啊等等性質相同的問題。經學研究的這個難處，其實就是林慶彰老師、蔣秋華老師和今天不在場的楊晉龍老師，包括蔡長林學長在內，他們在臺灣中研院文哲所經學文獻組長期做下來的工作，也就是文獻目錄的整理跟提供。這其實是為人做嫁裳，造福學界的功德！其助益的對象遑論無數的在學學子，學界無數獨當一面的教師、學者，利用此等文獻目錄者又豈在少數。然今日學界亦有人主張文獻目錄不算學術！此種學術界定難道就不偏狹？主張文獻目錄不是學問者，又豈可盡棄文獻目錄而言中國學術？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不滿經學研究只是停留在基礎文獻研究、版本校勘、目錄索引編輯這類傳統研究法，則他應該同時反省所謂「會通中西」的研究方法。若是只能以西方的方法、理論，來整理、詮釋、說明、研究中國傳統的經學、子學等文獻材料，以使之科學化、理性化、系統化、體系化，則此

種研究路徑其實是非常「西化」的，絕非「會通」！如果有一個學問從概念到方法皆取法於西方，則其又能體現多少中國傳統學術的特質呢？其又將如何維護中國學術的主體性？我的意思是說：一種捨棄中國傳統經學的為學法，以及否定經學之道德政治理想目的之意義系統的研究，難道不會滑落於中國思想文化之外嗎？這一個問題，如果李孝悌先生跟張隆溪先生在座更好，因為關於這個問題，我個人很想就教於非經學研究之高明學者，希望張萬民先生可以代為請益。我更想知道，年輕學子又是怎麼思考以上我所思考的問題，所以我叨絮了十分鐘。這些或許就是對臺灣經學研究，或是香港經學研究的一些反省，當然也是對經學研究的一些展望。我們最大的期望，就是此刻會場中，還留在現場的各位青年學子能共同來思考經學研究的未來！謝謝大家。

郭鵬飛教授：

謝謝金培懿教授這麼激情的表述。

馮曉庭教授：

各位老師，張老師，還有在座的各位來賓，我體重最重，他們的話語都很沉重，我的最輕鬆。我們先講一個笑話，我剛結婚的時候，因為財政用度不太會分配，有一天晚上，內人半夜把我推醒。她說，我們明天交了那個錢之後，就沒有錢了。我就跟她說，不是還有半條吐司嗎？她很生氣，捶了我一下。她說，你為什麼都不緊張？我說，因為我有熱情，我有生活的熱情。這個生活的熱情如果用在經學研究上面的話，這其實就是林慶彰老師教給我的。我記得林老師講過一個日本的《詩經》研究的學者，叫作村山吉廣，他編了一本雜誌叫作《詩經研究》。他說，老先生七十歲了，自己徵文、自己打字、自己印刷、自己出版。後來出了幾期之後，我就請教林老師：「村山吉廣的書為什麼沒有再出版了，沒有新的了？」老師就說：「那個先生很老了，做不動了。」那個時候我的感觸就很深，就是，為什麼這個事情會變成這個地步？我覺得個人很有幸，跟了林老師做了二十幾年的工作。林老師一直對經學研究很有熱情，在這個強大的熱情之下，除了撰寫論文，提出一些新的構想跟研究經學新的概念之外，最重要的是老師編了很多目錄，這是提升研究水平，讓所有的經學研究者能尋找到最適切資料的一個方式。接下來，就是編了很多套書，就是所謂的原始資料。在這兩個工作的支撐下，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要

這些經學研究的論題，還有它的可行性都呈現出來，讓後繼的學者可以有一個支取之道。當然，這個支取之道最後的呈現應該是經學研究的蓬勃發展，還有一些成果的呈現。林老師在這個概念之下，就辦了《經學研究論叢》這個刊物，我不知道香港這個地方對《經學研究論叢》這個刊物的認識有多少？最近這幾年，林老師把編輯的行政工作交給我來執行。《經學研究論叢》已經出版了二十二集了，今年開始要出版二十三、二十四集，以往都是年刊，現在要改成半年刊。每期現在大概可以收六到七篇的學術論文，只要跟經學、經書或經學史有關係的論文都可以被接受。裏面除了這些專門論文之外，還有一些經學人物的介紹；還有一項林老師很重視的，有一些近現代的罕見，比較不在市面上流傳的經學資料，我們也會把它重新打字，編排重刊。再來就是一個提供學界參考的資料——每年的經學的新書提要，還有召開過的經學的專門會議的介紹，以及專門的經學期刊的目次的介紹、篇目的介紹。這個刊物從一創辦到現在，林老師的想法就是，他希望各個階層，不管有沒有教職，只要是對經學研究有興趣的同好，都可以來投稿。我在這邊做個廣告，就是把林老師的這份心意向大家報告，希望各位在香港研究經學的同好，如果願意賜稿到《經學研究論叢》，我們當然竭誠為各位服務。各位來的稿子，最慢一定可以在半年之內出刊，如果各位有研究成果的話，非常歡迎賜稿給我們。我想這也是林老師從事經學研究三四十年來，最想要完成的一個工作。

郭鵬飛教授：

謝謝曉庭提供我們關於《經學研究論叢》的投稿訊息。

吳儀鳳教授：

在座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應該算是以一個旁觀的見證者的身分來發言。其實我是研究文學的，不過常常跟著林慶彰老師的團隊一起參與經學的考察活動，還有各方面的開會，有時候也寫一些論文。長期下來近身地跟著林老師，我的觀察，已經十幾年了。我本身在年輕時也是很叛逆的，在唸中央大學碩士班時不是一個很乖的學生。有時候我會就我所觀察到的現象向系上反映一些意見，比如說燈壞啦，怎麼那麼久都不修？……之類的，所以聽說有的老師是不喜歡我的。在進入社會工作以後，因為我之前對很多名利其實都非常地淡泊，不太會去追求或計較。長期在學界，當然也接觸過很多的師長輩、長者等等，但是可能後來觀察愈久

愈發現說，我們這個團隊有這麼多的同仁跟著林慶彰老師，都是受到林老師的人格感召的。因為，他真的是具有長者的風範，很多事情他都身體力行，學術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優先次序。林老師他的那種長者風範就是，他盡量都不希望麻煩我們。他只要跟學生在一起，一定是他來出錢，或者他來照顧學生等等。所以在我接觸到的許多師長和學者中，可以說大家對林老師都是非常地敬重，這是非常貼近的一個觀察，這是第一點。看到林老師做的工作，他很身體力行地推動經學的學術工作。

其次，就是我個人在學校教學的經驗，跟年輕的同學在課堂上的互動，比如說，我們常徘徊在文學跟經學之間的時候，我自己有一點小小的心得跟觀察。我發現在現當代的社會中，因為太受到西方的影響，所以其實是很重視個人主義，強調個體的。但是，這其實也造成了很多的思想上的問題，所以常常有很多負面的能量，比如說，負面的情緒，矛盾的心理，或是一些糾纏不清的精神上的問題。這些作為文學作品表達或抒發出來，好像也還可以，但有不少其實傳達的都是負能量的內容。不過在我回頭去看中國古典作品的時候，發現這些經典往往不會有負能量的內容。換言之，古代經學中，例如《詩經》，古人常強調教化的作用，一個作品出來後，都要考慮讀者讀了後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像我就覺得很奇怪，臺灣流行歌手蔡依琳，她唱的歌，歌詞內容是：「我呸我呸我呸呸……。」讓年輕的孩子們學這些歌，或是學一些粗鄙的話，但這樣的內容竟然很流行？為什麼要傳播這樣的內容呢？也許是一種年輕人的情緒發洩。可是，我們是不是都不太會去追溯那些流行音樂傳播的源頭，也不會去想：創作者是不是需要有一些社會責任？在現當代社會，強調民主、自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自由似乎可以無所限制。反觀在古代社會，隱約還是有一些規範和要求，諸如倫理道德等，這類隱隱約約有一把尺在大家的心目中的普世價值。傳統社會重視群體。我們今天讀經學或經典，它們之所以是經典，就在於其中傳達的思想價值觀都是正面的能量。所以，我喜歡給學生上課的教材是一些經典的文本。我們課堂上要傳達正面的能量。當然我也會上一些文學的文本，但是我都希望作品內容不要是晦澀的、負面的。因為有時候那樣反而把學生引導到一個不太健康的路上。我在教學中還有另一個觀察，在戲曲中，例如臺灣有一首歌謠叫作〈雪梅思君〉。那其實是一個很傳統的劇目：「秦雪梅弔孝。」秦雪梅和丈夫，他們只是訂了親，還沒有成親。可是她丈夫死了，而且丈夫之前就留下一個小孩。秦雪梅還堅持要嫁過去，然後撫養這個小孩長大。那小孩有時候忤逆，不服管教，打他時就反抗說：「妳又不是我親媽，憑什麼打我……」之類的

話。其實我覺得這個戲非常地感人，流傳這麼久，我發現它就是傳達了傳統的觀念。當然你現在會說：「那不就是三從四德！」像中國的書籍評語中都千篇一律地說那是封建禮教，是舊社會的產物。我有時候跟學生討論這裏面的古今歷史、價值觀變化的問題。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在現代社會去提倡「女子貞潔」，或是「從一而終」的觀念，這對學生來說，也是太可笑了！只是我覺得，可以從文本中引發我們思考：傳統社會跟現代社會的這些價值觀，是不是產生了什麼樣的改變？我們的社會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有些傳統的東西其實隱藏在戲曲、小說裏面，或者說，你看到大多數平民百姓都有著一些傳統的思想或想法。比如說，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的故事，到現在臺灣的歌仔戲還在演，臺下的婆婆媽媽看了還是非常感動。我常常在想：這其中感人的力量的背後，一定有其打動人的原因。那其實就是經典的力量，慢慢地你就會發現，經典真的歷久不衰，真正的正面能量就在經典裏面。所以這也是剛剛金培懿教授所說的，人還是要有一些正面的東西在前面引導著我們。如果少了這個東西，人們就會很容易感到迷失。所以說，東亞社會的儒家經典，因為一些基本觀念深入人心，有時候我們看到西方社會常有的大型社會犯罪，在我們東亞社會這類案件相對來說比較少，這個背後絕對和文化因素有關。這大概是我從個人角度的一些觀察來跟大家分享，謝謝。

郭鵬飛教授：

謝謝儀鳳教授，儀鳳教授的發言讓我想到了，我們要保存我們的精粹，文本的閱讀是很重要的。這讓我想起這幾年，香港中學中文科改革，就是要去掉範文，不要考範文，所以現在的學生中文程度是有點糟糕。這個政策很多人反對，教育局又開始改革，重新考範文（2017年開始）。不單是考試，我覺得有範文的話，讓同學比較深刻地了解經典是正確的。

邱惠芬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在座的學界前輩大家好。我沒有辦法像金培懿教授這樣從一個很宏觀的角度來談一個背景的問題，我就是延續著我在浸會大學那邊的論文去探討。因為最近寫的一些論文都有談到，民國初年以來地下出土材料的出現，在《詩經》的研究中該如何加以利用，然後去解釋。這次在浸會大學的論文，主要是寫《詩經》名物研究的部分。論文中提到香港學者陳炳良先生，從人類學、神話

學、民族學的角度去談《詩經》裏的「真實人事」，浸會大學的陳致教授則結合民族音樂學跟古文字學的部分來談《詩經》的分類。其實我一直在思考，每一個時代做學問的主體性與獨特性，民國時有新的出土資料，所以那時的學者重新檢視經典並賦予新的詮釋。而今，我們如果還是依循他們的方法及路向，沒有突破的想法及反思，其實很容易再落入同樣的窠臼。我最近讀了很多古文字在《詩經》名物研究的解釋，比如，郭沫若或聞一多先生從甲骨文或金文的字形，結合了文化人類學來談《詩經》裏的名物，相信他們當初提出來的時候，是很令人譁然的比附與聯想。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很新的東西，所以很容易會去接受或是探討。但現在，則應該重新回歸經典，把他們所研究的東西，重新檢驗。在我看來，《詩經》的名物研究，應該要能會通物理，也就是這個物它是怎麼形成的，其實有它複雜的歷史背景跟淵源脈絡。會通物理之後，最後還要回到貫通詩意，檢驗這首詩裏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草木鳥獸，或是這些器物的出現。唯有詩意的理解，才能進一步判斷是否可以說得通。如果說不通，那其實結合地下出土資料，或者是民俗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等林林總總的西方理論，也勢必是行不通的。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去重新定位古文字的研究運用，特別是從語源的這個部分，怎麼結合及回歸經典的闡釋。

郭鵬飛教授：

謝謝邱惠芬教授跟我們分享研究《詩經》的心得。我們再請魏老師發言。

魏綵瑩老師：

主持人、郭老師、在座的各位師長前輩，大家好。在這個經學的領域，我還算是晚輩，研究的功力也不深厚，但是我很幸運地能夠長期受到文哲所，還有臺灣研究經學諸位前輩的啟蒙。這一次很榮幸能夠跟隨著一起參與浸會大學的一個研討會，即盧鳴東教授主辦的「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個會議中，我自己收穫很多，我從某一個焦點上，講我自己比較深的一個感受。以往我們都覺得民國以後已經沒有所謂的經學了，因為在近代學術的分科之下，經學已經被劃分成了文學、史學、哲學。我從前對香港學術的一個印象，就如同車行健老師在最初的時候所提到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港臺新儒家。那麼對於港臺新儒家，我們想到的可能就是徐復觀先生、錢穆先生、牟宗三先生這些學者。不過我由於要

準備這個會議的文章，因此做了一些閱讀，並撰寫錢穆的相關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有了一種與以往不同的感受。像我們現在認為的錢穆先生，他是一個史學家；徐復觀與牟宗三先生是新儒家，也是哲學家。可是我閱讀他們的著作，還有其他與會學者的論文之深入研究，我覺得他們所談的學術，無論是我們認為的哲學還是史學，在傳統文化的大脈絡下，跟經學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經學沒有辦法從史學、儒學或哲學中被分割，而且在他們的學術視野下，經學還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傳統的學術思想，無論是要純粹研治經學，或者說我們未來要談史學，還是要講國學，乃至於我們要把自己定位成一個中國思想的研究者等等，諸如這些領域，其實經學都是非常基本的文化根柢。在座的城市大學朋友，特別有很多中文系與歷史系的年輕研究生，也有可能你們感興趣的方向是中國文學，也許你志在研究思想或是史學，無論如何，我覺得如果能夠同時關注、了解經學，一定能夠把文學、思想、史學這些東西研究得更廣大深邃與精彩。因為經學的底蘊深入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肯定是沒有辦法被割棄的。如果我們了解這一點，用心去鑽研，那麼要講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講得更到位，這是我的一點點體會，與大家分享，謝謝大家。

郭鵬飛教授：

謝謝魏老師。現在，我們還有些時間，自由發言。我們希望各位可以多點交流。臺下各位朋友，有沒有要發言的？

王佳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碩士生）：

各位教授你們好，我聽完各位教授剛才的講演，非常地感動。特別是金培懿教授剛才講的，就是我們還有好多在場的年輕學生，我們留下來的原因不是老師逼迫，其實真的是想有一些所得。我來自內地，研究生讀的是語言學，對於經學，之前也是沒有特別清楚的概念。參加這個論壇之後，我也算是稍稍有一點點入門。我有兩個認識，第一個認識就是各位所講到的，關於經學和經典保留的問題，真的是非常地傷感。剛才各位教授有講到，舉個例子好了，我來到香港和臺灣之後，發現有很多我們內地教育忽視掉的問題，在這裏非常地重視。所以可能對於學生接收到的一些問題，有時比較片面。因為我本人很喜歡臺灣，自由行去臺灣後發現，大家都很熱情，特別是愈到南部。我去臺灣之後，發現我不用去用 google map，因

為 google map 會把我帶迷路。我只要張嘴問當地的人就可以了，所以我很相信當地的人，我也非常覺得自己一個人去的話沒有問題。這個也是剛才教授講到的人性的問題，對於不同的文化，比如說剛才說一個非常苦情的劇，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大家還非常地喜歡。說明大家在心裏對傳統文化，在人性上的影響，還是非常偏向於我們以前認為所謂的倫理道德。但是現在這個世代，大家比較浮躁，可能找不到當初的那個根，沒有當初的那個根的話，就比較容易焦慮，產生了其他矛盾、衝突……的後遺症。第二點，就是老師您所講的，關於人性的問題，我非常地贊同。我是學語言學的，我們有看過一篇語言學的經典著作，本雅明的關於語言研究的文章，他裏面所講到的語言，也是我們老師朱純深教授他最近在做的一個論文，就是把本雅明的語言學理論和孟子的浩然之氣，還有在太極裏面的推手，這三種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匯集在一起。他所要表達的就是，不管是我們思想裏面的“mental beings”，還是我們說出來的“linguistic beings”，所反映的是，我們人在整個宇宙當中對於自己的反射。所以不管是任何的語言，或者是任何的經典，都是我們自己的人性在這個宇宙當中自己的定位，甚至是對於大家，也許我們說出來的東西，並不是我們思想裏的東西。或者我們想要說出來的東西，不是為了讀者而說，而是當下我看到一個葉子落在地上，我所想到的，我腦袋裏面的東西。這種對於人性的反映，我覺得不是推想而出的，而是一種本能。所以，並不是如各位教授很謙卑地說：「我們是來推銷新產品。」不是這樣的。而是我們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生物在這個世界上、這個宇宙上的本。所以作為新生的一代，我覺得各位老師不用謙虛，因為你們在引導我們的世界觀，謝謝。

金培懿教授：

我想很簡單地回應你一下。我們要讀經典，經典所以成為經典，它有三個條件。第一個，就是它是具有原創性、系統性的說明。再來，有一個重要的，它必須經過時間的淬鍊跟歷史的淘汰。所以我們鼓勵學生讀經典，不是因為我讀、研究經學，而是因為回到經典，就是等於回到原點。你回到原點，才會有原創力。我覺得我們在面對世界愈來愈平面，而且大家的雷同性愈來愈高的時候，無論是哪一個人，當他誕生來到這個世界，乃至整個民族的文化在不斷演變形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說，一種成功的人生或是民族的生生發展，其實就在成為你自己。成為你自己的時候，你就必須找出你作為一個人，或是說你誕生在這個民族或這個地方、國度

裏面的那個最原始的基因。我覺得我們做經學的人，是因為我們看到了那個形構這一個民族，或這一個文化的最原始的基因。所以我認為，那個就是我們必須回返，必須去真實撫觸到的那個最原始的生命文化核心的關鍵點。我想可以用這樣的說法，來回應這位同學。

余燦（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碩士生）：

各位老師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學研究生，來自內地。我是中文本科，你們都是學中文的，各位的存在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光芒。今天看到各位老師跟我們分享這麼多，內心很感動。我自己因為是學這方面的，所以有很多的感觸。我在內地接受教育，其實是很反感讀《論語》、《詩經》什麼的，因為老師老是要我們背。但是其實他們自己沒有解釋清楚，不明不白的程度，我自己會很反感。說這到底有什麼用？但是當後來我們進入到社會，你在成長中，每當回憶起背的這些東西的時候，感覺是歷久彌新的，而且是常讀常新。當我接觸到南懷瑾之後，他說是「剛日讀經，柔日讀史」，非常的給我啟發。我覺得所有經不僅僅是儒家，道家、佛家每一個東西都能夠給我們啟迪生活的感受。當我們生活遇到不快樂的時候，或者我們生活很開心的時候，經書會給我們的生活灌注一種新的能量。但是很多人不會像我一樣，因為南懷瑾是別人推薦給我的。但如果別人沒有跟我推薦的時候，我可能沒有這個渠道去接觸到這個給我帶來新的感受的東西。所以，各位老師做的工作是很偉大的，因為給我們一個渠道。當我們有這個渠道，進入到經書的世界之後，我們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現經書的美妙所在，我們就會自覺地再去挖掘。其實，內地這一點做得很欠缺，我們很少會有老師單獨開一門《論語》課，但是我們會有西方文學比較式的單獨的一門課。所以，各位老師今天的存在，讓我們感受到中國文化還是有救的，我們自己本來也是在做這個事情，以復古而創新。我們今天說我們是什麼一個產品，或者是怎麼樣的，其實都是古人留給我們非常珍貴的遺產；但是今天是一個經濟的社會，各位老師做了，勾勒了那麼多東西，居然沒有要把它變成一個商品，來這裏進行推銷什麼的。我覺得，我不會認為變成一個商品之後，它就貶值了。反而，我覺得因為時尚的問題，我們要讓大家接受這個東西，就必須走在時代的前面，我必須成為弄潮兒。當我成為弄潮兒之後，我就會得到更多的關注。我得到關注之後，才能站在時代的尖端，表達我想要表達的東西，讓大家來接受我，我非常敬佩各位老師，謝謝老師們。

黃富榮博士（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

我看留下來的基本上都是年輕人，我也拉雜地談兩點吧。首先，我覺得我沒有蔡長林教授那種沉重感。最主要的，還是研究的東西有沒有價值，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覺得，什麼東西也好，如果這種文化，可能幾百年前很有價值，而現在根本就沒有價值了，那很自然的，它就死了。比如說古埃及文化死了，現在已經是過去式了，現在的埃及跟古代已經不同了。不過，我們中華文化不同，中華文化可能有好幾十年，超過一百年，幾乎要燈滅了；但是我們很感謝我們的一些前輩，所謂港臺新儒學的前輩，還有林教授跟大家這個團隊，這個燈火還在，到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在這個全球化的形勢下，所謂「新文化」的問題出來了。已經有很多人，甚至在西方，比如所謂的 Boston Confucians（波士頓儒家）。他們提出：儒學——中國的學問——很可能是現在對治全球化引起的弊病的救藥，新的資源。這個就是我們文化的第二春。推銷不要緊，軟銷、硬銷不要緊，最主要還是這個價值。剛才我們的同學，已經通過他們自己的感受，展示出我們這個文化，是在現代生活的困擾中的一個出路。

另外一點，關於剛才車教授談到香港經學的發展，就是香港經學發展是很複雜的問題，因為還涉及殖民地時代英國的外交政策。學海書樓成立可能是民間的一個活動，但是後來成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的其中一個助力，那時候其實還有港英政府外交的考量。後來聘請羅香林教授、劉百閱教授，他們跟國民黨有密切的關係，這個也很可能跟當時港英政府的外交政策有關係。

郭鵬飛教授：

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了，我稍微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其實剛才發言的兩位同學都是我教過的碩士班的學生，他們在這裏的發言，可能是為了幫助我證明，我們今天來的學生都不是被迫來的。他們都是抱著學術的熱情，還積極地發言。非常地感謝大家，我們其實時間非常地有限，非常抱歉。但是在這個有限的時間裏面，我相信所有的聽眾，聽完了臺灣學術界的朋友這些發言，收穫都非常大。我個人的感想主要有兩點：第一點呢，這一次的論壇，其實是要喚醒我們大家去重視香港、臺灣等地在經學研究這方面的學術成果和學術傳承，以及重新思考我們這些前輩他們走過的路。第二點呢，是面對現代的這個學術體系，特別是面對我們年輕的學生朋友，怎麼去為經學這門學科重新定位？因為對於很多年輕朋友來說，經學最根本

的基礎已經沒有了，經學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已經沒有了。在古代的時候，高考、公務員考試都要考經學，但是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了。那麼對於很多年輕朋友來說，所謂經學的三魂六魄，全部都被現代的學術打散了，散落在文學、史學、哲學各個現代學術體系裏面。那麼，在這樣一個體系裏面，我們面對年輕學生朋友們，怎麼去重新解釋我們的經學研究？重新激起我們年輕的學生朋友對整個經學整體的認識、關注，以及是否能夠支持他們進一步的學術興趣？這是我的個人感想。最後感謝大家，感謝我們所有尊貴的來賓，以及感謝各位聽眾，謝謝大家。